

盛成

顧問

劉蕙孫

嚴薇青

編撰

方寶川

太谷學派遺書

九三老人顧廷龍敬題

第一輯（一）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方寶川編

太谷學派遺書
(二)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太谷學派遺書（一）

方寶川 編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出版發行

揚州市鳳凰橋24—6號

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裝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98.3

1997年3月第一版 199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00

廣陵編號：97XZ·200 定價：（精5冊）680元

张积中及其著述

方宝川

张积中是太谷学派史上一位最富有传奇性和悲剧性的传人。他创立的学派北宗，使学派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但又导致了最惨痛和最低潮时期的到来，并直接影响了太谷学派的发展方向。

张积中（？——1866年），字石琴，号雨溪，道号子中。江苏仪征人。有人曾根据其弟子朱玉川《养蒙堂遗集》中的一篇《祭文》：“夫子继志述事，绪崆峒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开来。于丙寅十月初六，命自天降……”，考定张积中的出生年月日为丙寅年（1806年）十月初六日^①。不知人们有否注意到，张积中在黄崖山殉难的日子恰恰也是丙寅年十月初六。当我们再仔细阅读一下该《祭文》，即发现这篇作于张积中殉难三十二周年忌日的《祭文》，在紧接上述文字之后，尚有“夫子归道山。小子罪重无德，未得从侍……”等语，故全句应断为：“于丙寅十月初六，命自天降，夫子归道山。……”此“丙寅十月初六”指的是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初六张积中的卒日，而非出生年月日。据阎敬铭《围剿黄崖山秦摺》及《御史乔树枏奏片》等称：同治五年（1866年）黄崖教案发生时，张积中年已六十余岁。故张积中的生年当早于1806年。

张积中簪纓世族，家丰于财。“少任使，好神仙，无书不读。”^②道光十一年（1831年），与表

弟李光炘一起赴扬州拜谒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辩难三昼夜，皆闻所未闻，因共受业于门焉。」③因二人天资聪颖，诚实好学，深得周太谷的器重。太谷病革时，授之心法。并遗嘱将来张要「还道于北」，李要「传道于南」。因张、李二人从太谷同学，未及百日，师归道山，所见所闻，不能了达。为了追寻太谷悟道的途径，甲午（1834年）、乙未（1835年）「两度匡庐，观云得悟」④。又于太谷的另一弟子陈少华朝夕讨论。戊申（1868年），三上庐山，实践师说。先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冥思苦索，探幽穷颐，遂豁然贯通。咸丰元年（1851年），督兵大臣周天爵以张积中为奇才荐于朝廷，未用。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诚拟罗张氏入军幕。敦请再三，乃往晤焉。后因政见不一而辞出。四年（1854年），因太平天国攻克临清州城，其兄张积功（字寄琴）死于知州任上，张积中遂以子绍陵（名稻生）为之嗣。六年（1856年），张积中举家北迁山东，曰：「丙辰迁于东，至于灵岩，遵成命也。昔太谷海子曰：『还道山东，大启崆峒，上延孔脉。……天其或者右吾道乎！予惜夫德之薄而从学者稀。予何知哉？勉勉循循，惟曰从事于学焉而已。』」⑤可见，此时张积中已自觉学问成熟，故开始着手实现周太谷要他「还道于北」的遗愿。七年（1857年），「肥城生员刘耀东（一作曜东）者，世居中黄崖，见积中而大悦，执弟子礼焉，割宅以居积中。积中遂迁中黄崖。」⑥开始公开授徒讲学，创立学派北宗。九年（1859年），又应博山士大夫之邀，一度迁徙博山，居白石洞，授业传道，故别号白石山人。十一年（1861年），捻军至青州博山，张积中避难复回中黄崖故宅。由于黄崖群山，山径丛杂，地势险峻，有北黄崖庄、中黄崖庄和南黄崖庄三村落。北隶长清，中与南隶肥城。张积中认为此地可避乱，遂以中黄崖为中心，利用先前山民所筑的石砦，踵而修之为寨，置守御具，以备盗贼。闻者以为可恃，来归者渐至数十百家。不

久，捻军又逼长清，避难者日多。为了安排难民，张积中对「凡入山避难者，山上设粥，山下设汤，来者皆得饮食。又设立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感其惠，归附益众。」^⑦于是黄崖山的规模日益壮大，从之者增至一万余人。张积中就在山上开文学房，建武备堂，避璇玑洞，筑太玄坛等。因山上读书人多，不习农事。为了教养兼施，补济山中生活财源，遂「自肥城之孝里铺，济南会城内外，东阿之滑口，利津之铁门关，海丰之埕子口，安邱、潍县诸处，皆列市肆，取名泰运通、泰来、泰祥、泰亨。」^⑧从而形成了一个集耕读、商贸、自卫为一体的村社组织。远近皆视黄崖为乐土，归之如市。人称张积中为黄崖夫子，或张七先生（因排行第七），而不敢直名。张氏在黄崖山讲学的概况，现已难得其详。外界传说则颇为神秘，云：「积中以神自畜，不轻覩人。其自远初来者，舍之文学房，令高弟吴某、赵伟堂、刘耀东等，转相授受，授读所刊《指南鍼》。五日一听讲，乡农不能诵习，任其去留。」^⑨

随着张积中在黄崖山名声日大，也引起了当地官府的密切注意。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山东潍县人王小花被捕后供称：「曾有人召其往黄崖山，认张积中为师，彼处聚众多人。」^⑩然而，经查核后断定「王小花并不识张积中，系闻人言。而传言之人，追究未获。」^⑪故难以加罪。五年（1866年）九月，青州府阎廷珮，益都县何毓福禀称：「擎获匪犯冀宗华、冀兆栋，供出同拜黄崖山张七为师，现山中业已聚集多人，令彼等赴青州一带勾匪，定期九、十月间起事。先取青州，后取济南。」^⑫紧接着又有临朐县何维桢禀称：「获匪郭嗣清等十一名，均供认为与黄崖山结众滋事。余供与冀宗华等相同。」^⑬山东巡抚周馥敬铭闻报，即以此为借口，派大兵团包围黄崖山，传令要张积中等五日之内出山自首。张积中义正辞严地申明：「吾讲学有何罪？若辈乃欲媒孽

我耶！贪黷官吏，欲借此以兴大狱，为立功也。我若往，彼辈锻炼周内，何求不得？即幸而事得解，乃公肯以磊磊落落之身，低首下心以乞活耶？汝辈惧，可自往也。」^⑭其子张绍陵亦跪请不已。张积中又怒曰：「积中此生，决不履公庭。必欲积中出者，积中出就死耳！积中亦丈夫也，伏剑而死则可，桎梏而死则不可，积中以身殉学矣，何为出！」^⑮表现了宁死不屈的精神。阎敬铭及其手下为了贪功邀赏，急令往剿。于十月初六日黎明攻山，当日破寨门，血洗黄崖山。张氏举家自焚，从殉弟子甚众，无一生降，是为震惊中外的「黄崖教案」。该案发难的人数，后有种种说法。《阎敬铭围剿黄崖山奏摺》自称：「共歼除匪党一千六七百名，坠崖落沟死者无算。……其余匪党及勾结枭匪千余人，均经悉数歼除，无一漏网。」《陈恩寿行述》则载：「阎敬铭欲尽屠山砦，经长清县知县陈恩寿启请而止。恩寿入山收集妇孺于山隘，归遣有差，保全者数百人。」《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等均认为，黄崖之难，死者已万余。

黄崖案后，世人扼腕悲叹，多视其为一大冤案。如《虞初近志·张积中传》曰：「砦既破，而未得谋反实据，阎乃责三王曰：『汝辈皆言谋反是实，今奈何无据？若三日不得，则杀汝辈。』」三王急，最后搜得戏衣一箱，命营中七缝工补治之，即以此为据，复杀缝工以灭口。」光绪年间，御史乔树枏曾上奏为之昭雪，提出该案系「阎敬铭误信人言所致」，故阎敬铭「时时内疚于心，旋即引疾归田，不敢再膺封疆之任。」其中「白发儒生，空山讲学，生被诛夷之惨，死蒙叛逆之名」诸语，读之令人心恻。后来，山东巡抚杨士骧文敬奉命将此案详细情形确查具复时肯定了：「张积中在黄崖讲学，『不可与邪说惑民同日而语。』拟恳准照原奏雪除张积中叛逆之名，以顺輿清，而伸幽抑。」只因清政府考虑到，「案情过重，恐与文介（阎敬铭）身后非常之遗，搁置未发。」^⑯所

以，在有清一代，黄崖教案一直没能公开平反。

张积中究竟有多少及门弟子。殉于黄崖之难和幸免于难的又有多少？张德广所编《归群宝籍目录》中，著录有《黄崖从葬诸先生墓志铭》一书，惜此书至今未获见，估计已散佚。先师刘蕙孙教授曾从《张氏遗书》、《白石山房文钞》、《白石山房诗钞》等著述中，辑录出七十个与张积中交往密切的人名，其中既有门弟子，也有挚友。^①今笔者以此为基础，再结合其它文献资料补充考证，已能确定为张氏门弟子的有四十九人：刘耀东（一作曜东）、张唯村、韩美堂、张光远、吴载勳（字慕渠）、张春崖、王启俊（字仲杰）、赵宽（字鸣岐）、赵成（字伯言）、刘荆山、朱渊（字玉川）、朱濂（字莲峰）、朱瀛、朱良峰、朱良甫、李素心（一作王素心）、张静娟（号蓉裳）、张石华、张珠华、张玉华、王显甫、李少平（汉章）、周习之（名径）、虞思农、虞作恭（字伯允）、虞叔渊（逊）、虞叔彦、虞叔申、虞从哲（字季升）、虞季通、赵明庵、吴友琴、子建、薛云璈、柳升、王宿南、子渊、子澜、子功、赵伟堂（建）、赵新堂（东阳）、孔海庵、栗堂、祝三、硕卿、慈溪、汪子顾、杨葆真、许式尧，殉于黄崖教案的有八人：刘耀东、张唯村、张光远、韩美堂、赵伟堂、李素心、张静娟、虞叔渊，因当时外出等不在山上而幸免于难的有十三人：吴慕渠、王启俊、张春崖、赵鸣岐、赵伯言、朱玉川、朱莲峰、朱良甫、朱良峰、王显甫、虞从哲、杨葆真、许式尧。其余诸弟子，除已知虞思农和吴友琴逝于黄崖案前之外，其他则情况不明，估计大都殉难。当然，上述人名之中，或名或字，尚难悉考，亦不免有一人误为二人者。兹暂列于此，以待识者补正。

总而言之，张积中所创立的北宗，经黄崖之难，虽尚有子遗，但道统几绝。此后太谷学派的发展，为了避祸，曾一度转入地下，逐渐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帷幕。尤其是继续遗留在黄崖山附近

的部分弟子，渐渐失去了讲学的宗旨，演变成了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团体。

二

在太谷学派的二传中，以张积中的著述为最多，其阐发太谷之学亦最力。据《归群宝籍目录》著录，张积中的编著共有十九种：《张氏遗书》、《张氏内注》、《白石山房文集》、《白石山房丛钞》、《白石山房诗集》、《白石山房语录》、《所见录》、《得所闻录》、《尚书批注》、《四书批注》、《楞严经释义》、《老子批注》、《庄子批注》、《关尹子释义》、《参同契批注》、《浅碧山房词选》、《黄崖太夫子遗著》、《春秋左传批注残本》、《璇玑洞书屋玄同集》，均未刊抄本。其中笔者经眼现存于先师刘蕙孙教授家中（以下简称「刘家本」）和泰州图书馆（以下简称「泰州本」）的有以下十一种。现将其主要内容及抄本情况，缕述如下：

《张氏遗书》，据黄崖弟子朱玉川《养蒙堂遗集·致虞季升书》云：「函大遗文，今年自秋及冬，锡翁，子翁业已敬谨校对。」该函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锡翁即黄葆年，子翁即蒋文田，系南宗李龙川的传人。可见传世的《张氏遗书》当为黄葆年、蒋文田于1898年所编订。现存的泰州本和刘家本均为传抄本。泰州本厘为三卷，刘家本则分为上下两卷，但所录篇目较泰州本为多。刘家本上卷以论说引伸《周氏遗书》中「十三经或问」的文字为主，下卷除了部分论说文外，多为张氏与朋友、门弟子间往来论学的书信。全书议论精妙，剥筭抽丝，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是研究张氏思想的最重要文献之一，集中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首先，张积中继承和发扬了其师周太谷的天道观，同样是通过对《周易》的解说和发挥来阐

明宇宙生成的规律和天人关系，如说：「乾一阳气也，坤一阴气也，体也，屯也者，坎一奇臂脊，其二耦则臂四支。下震一阳为赤，二阴为黑。赤黑相陶，陶诸坎中，包诸坎外，坎之德盛矣夫。故二气之行也，交于坎下曰屯，凝于坎上曰蒙。其动也，畜于坎曰需，临于坎曰讼。其静也，外于坎曰师，内于坎曰比。」又云：「乾坤屯蒙，序天时也。生万物成万物天也，春生之秋杀之亦天也。顺天者存，治日多，乱日少。故其为卦也，盖吉多而凶寡。」意思是说，宇宙是由大赤和深黑二气相陶而生成，并按其自然的规律发展。若顺其规律而行事，就会长治久安，吉多凶寡。反之，则凶多吉少。所以，修身处世者，「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知天也，发挥于刚柔而生爻配地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知人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其次，儒家各派对性命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而言之，有性善、性恶、性无善无不善、性有善有不善诸说。周太谷曾提出：「天之赋我曰命，父母赋我曰身，合德曰性。性也者，诚身之大本也」的著名命题。并认为：「性善非善恶之善也，盖言良知良能也。」⑮张积中对太谷的性命论，作出了许多具体的阐发，颇有见地。如：《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章诂》和《论性》这两篇文章，就分别集中辨析了传统儒家各派的性命学说，认为：「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斯言也，尽其性也，盖言乎性之性也，中道也。《论语》曰：空空如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斯言也，尽人之性也，盖言乎身之性也。性近乎心，倚乎阴也。《论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斯言也，尽物之性也，盖言乎命之性也。性近乎命，倚于阳也。《论语》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又曰：「告子言性，知生之谓性，而不知仁义之为性也。荀子言性，知耳目之性，而亦不知仁义之为性也。自宋而后，诸儒循孟子仁义之说，而后昧乎性

善之微，其失均矣。」在张积中看来，性是由命和身合成的，命和身是易变的，故性也是发展变化的，并非固定的。「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则善之具于性也，惻隐羞恶则善之降于心也，人皆有之。尧有之，桀亦有之，好善者有之，好暴者亦有之，谓生之谓性者亦有之。故曰：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故弟子问：「天命之谓性，奚谓也？」答之曰：「命，先觉也。其凝也命也，其通也性也。」若要久存其性，使天道下济于性，就必须发挥良知良能的作用，率「性」循「道」而行。性不可须臾离道，离道则难率，循道则可尽性于至命。故曰：「言性而不知道，乌足以言性！」

第三，周太谷在《周氏遗书》中推崇宋儒，不提阳明心学，并明确自称其学术渊源于「周、张、程、朱」。然而，《张氏遗书》则多处论及阳明心学，又颇有推崇之意。故有人据此认为：太谷学派也是「宗王学而薄宋儒」。^①或以为其思想直接渊源于王学。实际上，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张氏遗书》，就不难看出，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阳明心学是以致良知、明心性为要，其修养方式则渊源于佛教禅宗南派直接本心的「顿悟」法门。虽然太谷学派的身心修养目的同样是悟而见性，但其具体的方式则与王学不甚一致。如张积中《与秦云樵书（二）》云：「……故名顿悟。阳明致良知之说，亦是发明此旨。足下果于此再加一番究竟，或者豁然一悟，亦是学问中必当亲历之境。足下来因，似是玄客。……修玄之始，必先调息。调息既纯，至于身无其身，心无其心，脱去凡息，乃是真息。……足下单事调息最为相宜，设隐微之间，于顿法忽有所会，就丢开息字，于顿悟上用力一番亦好。但不宜兼用究竟，足下全力只宜在息字上磨炼。」《答王宿南》又说：「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近禅宗单提直指，一丝不挂，全当不易。……程子云：『圣人千言万语，俱教

人将已放之心反复入身来，「操则存，求则得之」，至易至难，易者，我所固有，难者，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习所夺也。故曰：「强恕而行」。弗强则弗能致也。「上说种种，旨在阐明凡入之心已被业识气染所迷惑，放之久矣。如果采用直指本心的「顿悟」法门，则普通人一时难以做到」。因此，太谷学派强调用「心息相依」的修养方式，强恕而行，渐渐启悟。可见，太谷学派的身心性命修养学说与王阳明心学，只能说是殊途同归，而无直接的渊源关系。

另外，张积中在《复徐梦卿》中，尊程、朱为「隐王」，说：「程朱隐王，见道各有浅深，要皆明道人也。议之者非明道者也。己则不明，转譬明者，所谓悖者之悖，固以不悖者为悖也，妄亦甚矣。三代以后，圣学不明，诸儒之意识为之也，孔孟之罪人也，若刘蕺山、颜习斋、李刚主诸君皆其人也。……后儒之终日是朱非王，是王非朱，居似忠信，行似廉洁，是即吾儒之傍门也，是不可不扫也。」又于《复示祝三》曰：「致良知之说，孟子而后知者寥寥。圣学衰微。正心诚意，自宋儒而一振。……明东林讲学，则纯以我之好恶，而行我之是非，愈降愈速，学乃大乱。」由此推知，太谷学派发展到张积中创立北宗之时，也没有「宗王学而薄宋儒」。他们遵循的是儒家博大宽容的优良传统，取长补短，同样称誉宋儒正心诚意和王阳明致良知之学说。他们贬低反对的是那些终日「是朱非王，是王非朱」的刘蕺山、颜习斋、李刚主之流，「纯以我之好恶，而行我之是非」的东林士子，以及「口言仁义道德，心存高官厚禄」的假道学者。

第四，太谷学派是否三教合一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张积中在《与秦云樵书（二）》中对此作出过明晰的论述：「仆尝思之，教已分三。其教既异，道亦不同。学佛而不髡缁，于佛之气脉必不贯矣。学道而不黄冠，于道之气脉必不贯矣。于必不贯之势，而欲于兵农

礼乐之身，希冀乎作佛升仙之路，明其理则可，成其道则难。窃比则为功，攻异端则为过。方以外之道而行乎方之内，不能也。方以内之人而达乎方以外，不得也。仁义之塞也久矣，苟志于道，无不以二氏为归，噫！学者之过欤！抑亦时会之为也。夫朝而《楞严》，暮而《参同》，出而礼乐兵刑，入而君臣父子。譬之北辙，乃驾南辕，杆不相入，有由然矣。很明显是说三教不能合一。但是，张积中在讲学的过程中，则经常引用《楞严经》、《金刚经》、《坛经》、《华严经》以及《参同契》、《关尹子》、《悟真篇》等，且《复徐梦卿》曰：「老氏之养气，盖修身之义也，佛氏之见性，盖尽性之义也。二者皆可以至命，故曰：我命在我。圣人则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盖兼而修之也。」《与子功书》：「吾门之学，当与二氏参看」云云，又不得不使人置疑纷纷。实际上，这还应从「三教合一」的内涵和实质上去理解。因为从历史上看，儒家学说自从创立之始，就提倡兼容并蓄，取长补短。据说孔子就曾问礼于老聃。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佛、道三家既斗争又融合，彼此影响，相互渗透。尤其是最具有中国特色，士大夫最感兴趣的佛教禅宗创立后，禅学思想影响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阳明心学，更大量地兼采了佛学禅宗和道教内丹的理论，遂有了所谓「新儒学」之称。但是，这种相互间的影响，从本质上讲，并不能等于三教合一。因为正统儒家的根本原则依然贯彻始终，吸收佛、道思想只是为了给儒家思想注入一些新的生机，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儒家博大宽容的传统。到了明代中后期，福建莆田林兆恩提出了三教奉行的「道」是同一的，没有什么根本原则的区别，主张把三教统一在其共同的本源之上，合三教为一教，创立了名符其实的「三一教」。就上引张积中的有关言论及「窃比则为功，攻异端则为过」的原则来推论，太谷学派与佛、道思想的关系，当属于宋明「新儒家」的范畴。

而与林兆恩的「三一教」则有明显的区别，更无什么直接的渊源关系。

第五，太谷学派提出的圣功大纲有教养二途：一以教天下为已任，二以养天下为已任。周太谷病革时，曾以《易》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来教导张积中。所以，张积中后来非常重视《周易·系辞》中的这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张氏遗书》卷上有一篇《货殖说》写道：「太谷曰：子贡货殖，盖所以济孔氏之穷也。孔子德圣人之德，而不能位圣人之位，故穷。不能位圣人之位，而不能不事圣人之事，故不可终穷。公养不继也，传食不行也，书社不封也。洙泗之间，杏坛之上，车服礼器而不可或阙也。子贡任之矣。子贡任之，故降志辱身而下为货殖之事。……后之学者心子贡之心，货殖可。」卷下则有一篇《示四记诸子并示兴亨》，对他主办的泰运通、泰来、泰祥、泰亨四家商店，「往来每多疑忌，大旨不以诚信为本」作了严厉的批评。告诫四记诸子：「讲学论道，推义利之辨，未尝不明。然徒托诸空言，则义以为质，而徵诸实行，则利以为归。今以至公之心，而犹有至私之隐。……予以学导诸子，而纳诸子于利，当予之心？然由此而从者门人，可以得万钟之养。……诸子昧乎义利，由细故而亏厥本心，则诸子之咎。涓涓不绝，将为江河。始之不慎，终必受其殃。」以此结合张积中在黄崖山建立集耕读、商贸、自卫为一体的村社组织等所作的一切来看，应该是遵循了其师周太谷的教导，实践了教养兼施的圣功大纲。其理财致富的最主要目的当与子贡一样是为了讲学论道，济于艰难。

第六，《山东军兴纪略》载：张积中在黄崖山「为祭祀堂以礼神，岁有尝期，恒以深夜参拜，升降礼节繁缛。素馨（心）、薝蔔盛装挟剑而侍。旃檀燎烛，熏赫霄汉，数十里外望其光，乡愚辄

称：「张圣人夜祭」。顾非其徒，不能入窥也。」故长期以来，外界普遍认为张积中在黄崖山的祭祀活动很神秘。或据以推断：张积中「创立的黄崖山学社，具备了宗教的一切特征，故称其为黄崖教。」^{②①}笔者认为：《山东军兴纪略》系镇压「黄崖教案」的刽子手阎敬铭的幕僚所编，他们是在将此案定论为「邪教」的基础上来编写的。为了掩盖该冤案的历史真相，难免有夸大罗织之辞，故不可据之为典要。又有把太谷学派门人御史乔树枏在光绪年间为黄崖案翻案奏片中所说的：「张积中之所学，是否即邪教，自有一定之是非。即使实系邪教，亦迥然与叛逆殊科。」理解为「竟不断然否定其为宗教的诬指，事实上就等于默认。」^{②②}对此，笔者亦不敢苟同。从当时的情况看，乔树枏是黄崖案后第一个公开上奏为黄崖案昭雪的人，因不知清政府的态度及考虑到阎敬铭的势力，故全文的语气十分委婉。从上引「张积中之所学，是否即邪教，自有一定之是非」的语气来理解，应当就是一种婉转的否定，所以紧接着才有「即使实系邪教……」这退一步的说法。后来山东巡抚杨士骧（文敬）奉命将此案详情确查具复时，即十分肯定地指出：「张积中当年「避乱入山，优游讲学，人皆比于魏禧之在翠微峰，孙奇逢之居五公山，声称至今未决。即其发明性理，尊尚良知，亦以儒先陆、王为宗，而不可与邪说惑民同日而语。」^{②③}但是，最后也是「以案情过重，恐与文介（阎敬铭）身后以非常之遣，阁置未发。」^{②④}今从太谷学派的遗书资料来考察，虽然自周太谷开始，就十分注重「俎豆」之类的祭祀礼仪，但其实质与内涵均不同于宗教组织的祭祀。周太谷所祭之神，除了先圣先祖之外，绝大多数为自然神，意在慎终追远，对自然界的报德。张积中在博山、黄崖的祭祀，也是遵师道而行之。如《张氏遗书》中就多处谈到：「昔者闻诸夫子曰：『匪德者毋妄祭也。』……夫子复育我，以尧舜之道道我，以周公孔子之学诱我。」「祭也者

大，报本反始也，何谓也？曰：命本于天，先王所以行郊社之礼也，身始于父母，禘尝之义，君子所以重焉。「俎豆约其志也。颜子曰：『约我以礼』。八善博其气也。颜子曰：『博我以文』。」表明了他把祭祀当作一件大事，旨在慎终追远，报本反始，通过祭祀这一手段，来达到「博文约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心不外务、虔诚敬畏的境界。说到底，也是为了身心性命修养的需要，并不具有纯粹的宗教意义，更没有形成「具备了宗教的一切特征」的组织或团体。

《张氏内注》一卷，卷端题为七篇，实存：《学之节自注内注》、《敦仁篇内注》、《近取说内注》、《远取说内注》、《夫仁者节内注》五篇。主要内容是阐发性与天道及身心修养的原理，讲求如何「反身而诚」。所叙深奥神奇，但多有人身神气运行的情状及实践时体验的记录。如：《学之节自注内注》云：「大赤感黑而玄生焉，大黑感赤而黄生焉。……故曰：性一静，玄静也，贯贯而入，大赤散为众理者，渊渊而入于火玄也。情一动，黄动也，贯贯而出，大黑聚为一理者，浩浩而出于大黄也。」《敦仁篇内注》曰：「脉聚而后精畜，精畜而后目明，目明者观色而始知。络聚而后气藏，气藏而后耳聪，耳聪者闻声而始辨。此儒者索隐之功也。精聚而不散者，不睹而明，不见色而已知也。气藏而不发者，不闻而聪，不聆声而已辨也。此贤者知微之业也。」

《随所得录》一卷。上半部分为张积中治学之心得，多发前人所未发。如曰：「寂灭非生灭之灭，长生亦非生灭之生。穷理穷到那穷处，与肾气息息相通。尽性尽到那尽处，与胃气息息相通。」后半部分则以摘录《大学》及宋儒二程、张载、朱熹等语录为主。着重于阐释宋儒对「明德」、「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等命题的论述。此亦为太谷之学与宋儒关系的旁证。

之一。

131

《所见集》一卷，是张积中读书笔记之摘录，约二百条。刘家本在有些文句旁加上单、双圈，以示重点所在。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乎」和「而」两虚字旁加圈。「郑伯克段于鄆，鄆下邑也。」则在「下邑也」三字旁加联圈。「朱子云：谈浮图者，仰首注视而高谈，不若俯视历阶而渐进」，又在「俯视历阶而渐进」旁加圈。至于为何在一些虚字旁加圈的真实涵义，尚难理解，估计与其修身的体验有关。

以上三种，刘家本均独立成册，泰州本则合为一册，题为《张氏遗著三种》。

《白石山房语录》二卷，《归群宝籍目录》题为《白石山人语录》。泰州本仅作一卷，据笔者考证：泰州本《希平夫子语录》一卷当为《白石山房语录》下卷之误题。②该语录系张积中讲学山东时为弟子所记，可能未经张氏本人整理审订，上下卷中尚有部分重复的内容。所云随地设喻，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亦为研究张积中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

该语录无论是谈性与天道，还是讲三教与人生，一是以「能近取譬，近取诸身」为原则，与太谷学派的「圣功」修养紧密相连。所谓「圣功」修养，就其内涵而言，即身心性命之学。张积中在总结了周太谷的修养方式的基础上，将其归纳为「心息相依」四字以点明机窍。何谓「心息相依」？心就是人心、人的思想，息就是流转于天人之间的命和生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合二为一，而是通过各自的修养以达到相互依存。张积中认为：「气见之于身，就是普通的呼吸。一吸则气升，一呼则气降，凡息自然之升降也。」凡人一呼则闭其明，一吸则闭其聪，思路不通也。」这种情况，属心息不相依。「息不止从口而出也。目视则从目出，耳听则从耳出，鼻嗅则从鼻出，